

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

ZHE JIANG SHENG BO WU GUAN DIAN CANG DA XI

史前双璧

SHI QIAN SHUANG BI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

史前双璧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前双壁 / 浙江省博物馆编. —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9. 4

(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

ISBN 978-7-80715-449-5

I. 史… II. 浙… III. 文物—简介—中国—原始社会
IV. K8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8136 号

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
史前双壁

浙江省博物馆 编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朱艳萍 张 姣 徐晓玲 杨少锋
艺术总监 朱艳萍
美术编辑 刘 欣
激光照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13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5-449-5
定 价 188.00 元(平)

序

浙江省博物馆创建于1929年，初名“浙江省西湖博物馆”，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博物馆之一。经过近八十年的发展，如今已成为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和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人文科学博物馆。多个馆区分布于杭州城市中心，包括西子湖畔的孤山馆区、大运河边的武林馆区、老和山旁的文博科研基地、栖霞岭下的黄宾虹纪念室和昭庆寺东的沙孟海旧居等，展示着浙江自古迄今优秀的传统文化，彰显着一种开拓进取、历久弥新的浙江精神。

自建馆以来，经过几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及社会各界的支持，藏品总数已近十万件。其中，以稻作文化为基础的河姆渡文化的遗物，实证文明起源的良渚文化玉器，“春秋五霸”之一的越国文化遗存，支撑“瓷器之国”的越窑青瓷、龙泉窑青瓷，装点“东南佛国”的五代两宋的佛教文物，以及南宋时期的金银货币，汉代会稽镜，宋代湖州镜，古代漆木器等，不仅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而且还具有颇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此外，历代名家书画、玺印，现代革命文物等，也都是影响浙江乃至中国历史，推进文明进程的宝贵遗物。

为发挥藏品的作用，本馆除了在省内举办各种陈列、展览外，还曾在全国各地和德国、日本、新加坡、法国、瑞士、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展出具有浙江特色的文物艺术品，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和兴趣。与此同时，各种反映本馆藏品的专著和图录亦陆续出版，对繁荣文化事业、推动学术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陈列展览不仅内容有限，而且难以与人朝夕相伴，既往的出版物又未能全面、系统展示本馆藏品的基本面貌，所以，在信息化的新世纪，我们以图书为载体，将本馆收藏的具有代表性的藏品编辑成《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十二种出版发行，以冀使更多的人了解浙江的历史与文化，准确地掌握本馆藏品的基本信息，促进展览交流、学术研究、艺术鉴赏，为文明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知识和精神的累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作为历史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文物艺术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蕴涵着无穷无尽的生命力，不仅是逝去时代各种信息的载体，而且对当今社会的进步也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意义。展示历史文化遗产，发掘其固有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弘扬和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交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浙江省博物馆义不容辞的要务，《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的出版，意义正在于此。

浙江省博物馆常务副馆长

陈浩

综 述

□王屹峰

浙江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是个多山脉、多丘陵、多河流和多湖泊的地区。受地形、地貌及环境变迁的影响，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在今浙江境内的活动及其文化遗存呈现出多样而复杂的面貌。就浙江70年以来的考古工作而言，可以划分为四个区域：浙北以钱塘江为界，江北太湖流域的杭嘉湖地区，发现了距今约七千年至四千两百年连续更替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¹⁾。江南宁绍地区，发现了距今约八千年的跨湖桥遗址⁽²⁾和约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³⁾。浙中丘陵地带，近年来还找到了距今约一万年的上山遗址⁽⁴⁾和约九千年的小黄山遗址⁽⁵⁾。浙南山区人类活动相对滞后，但在瓯江流域也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晚期阶段的好川文化⁽⁶⁾。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史前文物大部分出自以上四个区域的考古发掘。

一

浙江最早开展考古工作的区域是杭嘉湖地区。杭嘉湖地区的考古工作始自20世纪30年代，浙江考古的先驱们对杭州古荡遗址（即老和山）、杭县（今余杭）良渚遗址和嘉兴双桥遗址的调查和试掘。尤以1936年5月至1937年3月浙江省西湖博物馆（今浙江省博物馆）的施昕更对良渚镇和瓶窑镇的棋盘坟、茅庵前、荀山和钟家村等十余处遗址的调查和试掘影响最大，其成果《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于1938年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整理出版⁽⁷⁾。几乎同时，曾任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主任的何天行也在良渚一带调查，并于1937年刊布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文⁽⁸⁾。受此影响，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考古学界的视野主要集中在太湖流域，直至70年代，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先后被命名，整个太湖流域史前时期的面貌逐渐明晰起来。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这个阶段试掘和发掘的老和山⁽⁹⁾、钱山漾⁽¹⁰⁾、水田畈⁽¹¹⁾、朱村兜⁽¹²⁾、苏家村、邱城⁽¹³⁾、马家浜⁽¹⁴⁾、彭城、罗家角⁽¹⁵⁾、双桥⁽¹⁶⁾等重要遗址的出土文物全部或部分入藏于浙江省博物馆。80年代以来，反山⁽¹⁷⁾、瑶山⁽¹⁸⁾等良渚大墓的发掘和良渚文化中心区域“良渚遗址群”⁽¹⁹⁾的确立，预示着这一地区考古工作收获季节的来临。其中反山第12、16、18、19号墓和瑶山第3、10、11号墓出土文物为浙江省博物馆收藏。与此同时，关于文明起源的讨论及考古工作逐渐展开，此后其他一些重要遗址相继被发掘，如普安桥、南河浜、仙坛庙、新地里、庄桥坟、塔地和江家山等⁽²⁰⁾。2006—2007年又在“良渚遗址群”的中心区域莫角山周围发现了一圈城墙，为文明起源的探索寻找到了新的重要证据⁽²¹⁾。

宁绍平原考古的突破从20世纪70年代河姆渡遗址两期震惊世界的发掘⁽²²⁾开始，此后河姆渡文化的探索一直都是这一地区的核心内容。河姆渡遗址保存了各类丰富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原始艺术品，大面积的榫卯木构建筑遗存，大量的稻谷堆积及动植物遗存，浙江省博物馆收藏了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中的主要部分。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史前时期长江流域的文化发展水平、探索世界范围内农业起源中心以及水稻的起源和传播，都具有深远的意义。随着河姆渡文化的命名，慈湖、名后山、鲞山、鲞架山等数十处同类遗存相继被发现，对于河姆渡文化的认识也逐渐趋向明晰⁽²³⁾。对河姆渡文化的考古发掘和探索研究从未停止过，自2001年以来至今仍在进行发掘的田螺山遗址，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环境条件最好、地下遗存比较完整的一处依山傍水式的古村落遗址”，对于了解河姆渡文化的内涵、年代、环境变迁、聚落形态等均具有重要的突破性意义⁽²⁴⁾。然而，由于河姆渡文化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较为发达阶段的特征，所以一直以来对于能否在浙江发现更早阶段的遗存，成为学术界更为殷切的期望。

20世纪90年代,浙江考古界的视野开始从平原转向浙中丘陵及小河流域。在此之前的五六十年代,浙江考古界曾经对钱塘江以南地区的许多遗存进行过调查和试掘,但仅仅得到了一些线索,而收获和认识有限。至70年代末,对于马桥文化或称高祭台类型文化遗存的认识却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如淳安进贤遗址⁽²⁵⁾、江山肩头弄类型遗存⁽²⁶⁾,这些地点的文物标本也均全部或部分藏于浙江省博物馆。90年代,丘陵、山地等以往考古工作薄弱地区逐渐受到重视,以小河流域为单位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重要成果⁽²⁷⁾。1997年,位于浙南山区瓯江源头好川墓地的发掘更是给予浙江文物考古界很大的启发⁽²⁸⁾,并且随着稍后温州老鼠山遗址的发掘⁽²⁹⁾,好川文化逐渐为人认识。2001年以来,属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上山、小黄山、跨湖桥等遗址的新发现,以及跨湖桥文化和以上山、小黄山为代表的另一种新型的考古学文化逐渐为学术界认同,对于浙江以及长江下游流域史前历史的时间上限、区系类型、水稻起源、环境变迁以及人类为适应环境所采用的多样性生活方式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均有了重要突破。

一

农业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是一场发生在新旧石器时代过渡之际以动植物的驯化取代原来的采集、狩猎经济的食物生产技术变革及其所引起的文化变革,柴尔德和布雷伍德称之为“农业革命”⁽³⁰⁾。现在确定的全世界农业起源中心有三个:一是地中海东岸,大、小麦起源于此,同时也是最早驯养绵羊、山羊之地;二是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分别是小米(粟和黍)和大米(水稻)的起源地,还最早驯养了猪、水牛等家畜;三是中美洲,是玉米的起源地⁽³¹⁾。

而在河姆渡遗址出土大量水稻遗存之前,国际学术界一直以为人工栽培水稻的起源地在南亚地区。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现掀起了世界范围内对于人工栽培水稻起源的探索热潮,长江流域最终被确定为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之一。此后的二十余年中,长江中下游地区稻作农业考古取得了重大进展,发现的水稻及相关遗存的数量不断增加。据对已公布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发现的古栽培稻遗存,至少已达176处,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多达134处,占76.1%。其中长江中游流域75处,占42.6%,下游流域59处,占33.5%⁽³²⁾。近年来,由于认识的提高和考古方法的进步,发现栽培稻的遗址越来越多,所以实际数量当远远不止已公布的数字。

长江中游流域,在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吊桶环和仙人洞发现的距今一万余年的稻作遗存,已经非常接近人工栽培水稻的源头。从距今9000年以降,像湖南澧县彭头山、八十垱、城头山和湖北城背溪等一系列稻作遗存的发现,为确立长江中游稻作起源中心提供了连续而广泛的考古学证据⁽³³⁾。

长江下游流域,自1973年河姆渡遗址发现以来,虽然有浙江桐乡罗家角、江苏吴县草鞋山⁽³⁴⁾及其他众多遗址和稻作遗存的揭露,但在起源探索和研究上一直未有新的突破,直至近年才有了一些新的重要发现,集中在浙江境内。2001年首先在跨湖桥遗址发现了距今约八千年的炭化稻谷遗存⁽³⁵⁾。2002年作为跨湖桥遗址之一部分的下孙遗址发现了经栽培的稻米⁽³⁶⁾。2003年在距今约一万年的上山遗址发现了古稻,通过对陶片中掺和的稻谷颖壳和植物硅酸体的分析,结论均指向处于驯化初级阶段的原始栽培粳稻⁽³⁷⁾。2005年在距今约九千年的小黄山遗址“A区地层中稻属植物硅酸体的大量发现表明小黄山先民已经栽培或利用水稻”⁽³⁸⁾。同样,长江下游从距今10000年到7000年,稻的栽培是上山、小黄山、跨湖桥、河姆渡、罗家角、田螺山等众多遗址共同的文化面貌之一,不但时代早、分布广、数量多,而且具有连续性和广泛性,由此证明长江下游流域也应该是稻作起源和水稻驯化的中心之一⁽³⁹⁾。

因此,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毋庸置疑。栽培稻粒型逐渐稳定为倾粳型的转折点,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在距今5000年前后⁽⁴⁰⁾,在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处于良渚文化时期。

农具是稻作农业的重要内容之一。上山遗址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石磨盘、石球和石棒,小黄山遗址也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磨石、石磨盘,燧石质石锤数量也不少,这些可能都是获取食物和加工食物的工具。但是只有“石镰或石刀是上山遗址出土的功能比较清楚的农具”,摘穗收获时使用,主要功能不是切割而是折断,以提高效率⁽⁴¹⁾。

随着稻作农业的逐步发展,农具也开始出现变化。骨耜是目前比较能够确定的典型水稻耕作工具之一。在跨湖桥、河姆渡、田螺山、罗家角等遗址均有出土。河姆渡遗址共出土骨耜194件、木耜2件,其中属于河姆渡文化主体部分的第一期文化遗存中出土骨耜154件,第二期为38件。河姆渡的骨耜是利用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加工制成的,如“大小接近于梅花鹿的鹿类肩胛骨、犀牛的髌骨和形态接近肉食类且大于虎的动物的肩胛骨”⁽⁴²⁾。耜的加工方法是在肩臼处横向凿孔,并在脊椎缘部位打双孔,再用藤条捆绑木柄而成。跨湖桥、罗家角的则有所不同,取材于一种更大型的哺乳动物肩胛骨,并在其肩臼顶端凿耜插柄⁽⁴³⁾。这种安柄方式的不同,或可仅仅解释为不同地区、不同环境造成的耜材源略有差异而已,但重要的是这些遗址在相近的时间段内均使用了同质同类农具——骨耜。从另一个角度看,骨制品的丰富程度也反映出狩猎在广谱经济阶段的重要性,而农业仍然有待进一步发展。

同时,稻田以及稻作栽培方式的变化过程均有所发现,各地情况不尽相同。早期阶段如地处丘陵地带的上山遗址,稻栽种在水分供给不良的水际坡地甚至高地,所以往往出现旱稻的特性,之后才逐渐向山地和平原的结合部发展⁽⁴⁴⁾。有学者认为稍晚一些的跨湖桥遗址的人群可能选择湖边泽地通过烧荒的方式来开垦稻田和种植水稻⁽⁴⁵⁾。稻田的形态和大小,如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揭露的距今6500年左右的水稻田,三条田埂间形成二丘田⁽⁴⁶⁾。马家浜文化时期的草鞋山遗址共发现水稻田44块,以及相应的蓄水坑、水沟等“灌溉”设施,其中稻田呈单个浅坑形、圆角长方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面积一般为3—5平方米,最小的田块仅0.9平方米,最大的也只有12.5平方米⁽⁴⁷⁾。埭墩遗址发掘了面积1—16平方米、呈圆角长方形或长条形以及不规则形的水稻田24块,最大的也只有16平方米⁽⁴⁸⁾。这一时期的稻田在垦作方式、规模大小上均呈现多样性形态,当与区域环境或区域文化发展水平有关,也与稻作农业的发展规律有关。

继骨耜、木耜之后,一种新颖且似乎更为高效的生产工具——石犁开始使用。石犁最早出现于崧泽文化时期,至少一直延续到相当于中原商末西周初期。崧泽文化墓葬中第一次发现的石犁就是1957年发掘的邱城中层墓葬中出土的那件(M4:1)⁽⁴⁹⁾。崧泽文化时期出土石犁的地点并不多,但湖州毗山遗址是个例外,在崧泽文化晚期墓葬中共出土石犁21件⁽⁵⁰⁾。到了良渚文化时期,出土石犁的地点发现得略广泛些,但总数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甚至更少⁽⁵¹⁾。更为奇怪的是在钱山漾遗址,据发掘者称,集中出土了大量类似石犁的残件,达125个个体之多,还有两件基本完整并可以确定为犁或犁头⁽⁵²⁾。从毗山、钱山漾两个个案看,是否意味着从崧泽晚期阶段开始至夏商之际,太湖流域在适合较大面积农耕的局部地区石犁才被较多地使用,而不是如以前所认识的那样——石犁在崧泽文化时期出现但使用较少,而在良渚文化阶段已在各地被广泛使用?从目前发现以太湖南岸数量多且集中的特点看,是否还意味着当时这个小区域的土壤和环境比较适合石犁的使用?石犁的使用有两种方法:一种如毗山崧泽时期墓葬,仅随葬三角形犁头部分,个体较小,可能意味着可以单独使用。另一种是组合式分体石犁,犁头只是作为其中一部分,崧泽时期也已经出现,最近在长兴江家山遗址崧泽时期地层中出土了一套三件组合式分体石犁⁽⁵³⁾。更为重要的是,平湖庄桥坟遗址良渚文化中晚期的H70坑内发现一套带有木质犁底的三件组合式分体石犁,为完整复原石犁的组装方式以及石犁的确切功能提供了直接证据⁽⁵⁴⁾。庄桥坟石犁通长达106厘米,木质犁底的尾端还有装置犁辕的榫口,如此大型的耕作农具,无论是由人还是由牛来牵引,如果没有大田都将无用武之地。因此,仅就石犁本身而言因农具技术含量的提升应当更为高效,它的发明和使用,似乎可以反映农田大型化时代的到来并意味着生产关系变革的不可避免⁽⁵⁵⁾,但同时其出土数量和广泛程度又不能完全说明之,也有学者暗示大型石犁可能并不具有实用性质⁽⁵⁶⁾。

陶器的发明或与人类饮食方式及食物生产的变化——更具体地说,与农业的起源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那些主要作为炊煮器的起源阶段的原始陶器,都应该是针对谷物等食物的加工而被加以采用的⁽⁵⁷⁾。跨湖桥、马家浜、河姆渡等钱塘江两岸时代相近的几个文化,均以陶釜来炊煮食物,只是釜的形态有所区别而已。陶釜需要挖灶炊煮,马家浜文化的宽大腰沿釜可能就是如此,而更多的则是与三个单独的支座配合使用。也有认为腰沿釜是用来承接炊煮淀粉类食物时的溢出物的。淀粉类痕迹确实在各个遗址的陶器中时有发现,如跨湖桥遗址统计的1843片陶釜残片标本中,有541片带有“锅巴”痕迹,占29.4%⁽⁵⁸⁾。晚一些的时候出现甑,中间安置一层多孔的隔,非常适合稻米与其他食物一起蒸煮,江南地区至今仍在使用的同类器物。良渚文化时期则完全使用三足与器身连为一体的鼎。随着农业的发展,

陶器不同于以往仅为盛装、炊煮果腹食物的目的而制作，许多具有新功能的器皿开始出现，种类也越来越多，如盃、鬲、豆、壶等。甚至有学者认为早在跨湖桥遗址时期可能就已出现了酿酒等以美食、宴享为目的的生产活动⁽⁵⁹⁾。

作为农业的组成部分，动物的驯化、家畜的饲养也随之得以发展，以家猪起源为例。陶塑、刻纹猪的形象及猪骨，在距今8000—5000年的遗址中已发现较多。河姆渡遗址出土过一件泥塑陶猪（T21④：24），一件陶钵（T239④：235）的长边前后两侧各阴刻一猪纹图像⁽⁶⁰⁾。马家浜文化的罗家角遗址出土一件陶猪（T129④：11）⁽⁶¹⁾，邱城遗址下层出土两件陶猪⁽⁶²⁾，崧泽遗址的马家浜文化时期灰坑中出土过陶猪一件⁽⁶³⁾。崧泽文化阶段也曾出土了一件外壁堆塑成猪首形的陶匱（M52：2）⁽⁶⁴⁾。从形态而言，野猪和家猪是有区别的。罗家角、邱城、崧泽出土的陶猪均呈圆胖形象，更容易使人联想到家猪。河姆渡遗址的最为写实，猪纹陶钵上的猪纹图像和泥塑陶猪的特征均介于家猪和野猪之间，或可解释为处于驯化过程中。

但作为艺术形象的证据远没有猪骨遗存证据来得直接和可靠。家猪的骨骼，在许多遗址中均有发现。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家猪是迄今发现的南方地区最早的家猪。跨湖桥遗址出土猪的骨骼经鉴定，部分为处于家畜化过程中的家猪⁽⁶⁵⁾。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家猪个体骨骼大约有73个。同时，河姆渡遗址一些探方的早期层位中，还发现了直径2—3厘米下端削尖的小木桩，以及由50—60根这样的木桩围成的、直径约一米的圆圈和二圈交错的套圈建筑遗迹，可能与圈养家畜有关⁽⁶⁶⁾。此外，罗家角遗址、龙南遗址、崧泽遗址、良渚文化遗址及马桥文化遗址出土的猪均显示为家猪的特征⁽⁶⁷⁾。

家猪在农业经济中的地位，不仅仅能从陶塑、刻纹形象和遗留的骸骨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而且还可以在祭祀和陪葬行为中得到体现。庄桥坟遗址1号土台西南侧的H18为祭祀坑，其中放置了一头驯养的成年猪，猪的骨架保存得相当完整，这种以整猪、猪的獠牙和猪下颌骨来祭祀和陪葬的现象在各地时有发现⁽⁶⁸⁾。从纯粹为了果腹的目的，到作为营养性或美食性食物，再到具有财富、地位、繁殖、宗教或其他象征意义的功能，反映了社会正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并趋向复杂化。

三

农业的发生和发展，逐渐推动了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加剧，即文明的起源。社会复杂化过程在良渚文化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在许多物质遗存上均有体现。

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成组玉制礼器为特点的、影响整个东亚文明进程的良渚文化，是世界文明起源历史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进入了严格意义的“稻作”农业阶段⁽⁶⁹⁾，到了距今四五千年前盛衰于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时期，很快形成了以玉器的制作、分配和占有为标志的多层次社会结构，并在中国史前文化整体迈向复杂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中处于领先水平，被公认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玉的国家。古代先民很早就开始有意识地选择使用一些不同于普通石头的材料，并且逐渐赋予其越来越多超出自然属性以外的内涵。距今8000—5000年间，是长江下游玉器发生期。目前发现的较早的玉器，主要有以下这些：出土于跨湖桥遗址的玉璜2件，已经运用钻孔技术⁽⁷⁰⁾。属河姆渡文化的田螺山遗址在一个灰坑内也出土了一堆萤石、燧石制品，由39件块状原料、管珠类半成品和两件燧石质钻具组成，对研究早期玉器的原料、器形、功用、工艺等是不可多得的材料⁽⁷¹⁾。河姆渡遗址各层出土的玉石器有玉玦32件、玉璜30件、玉管形器36件、玉珠形器90件。属于马家浜文化的罗家角遗址出土玉管2件、马家浜遗址玉玦10件、邱城遗址玉玦4件。浙江地区这些距今8000—6000年的遗址所出土的玉器，均以玉玦、玉璜等小件为特点，有些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透闪石软玉，而是石髓、石英、叶蜡石、萤石、方解石，或可称“美石”，所以也可称为石器。器物出土的位置更多地显示着其最初的功能，如玉玦的原始功能以耳饰为主，塔山M17和M24、江家山M238出土玉玦均在耳下，少量发生变化，如江家山M239是在左手指上⁽⁷²⁾。特别是这个时期的晚段，以解玉砂为介质的琢玉技术基本成熟，对同一大块原料的多件体分割方式已初步应用，例如玉玦的早晚变化，呈现出造型逐渐规整、厚薄日趋均匀、形体由小变大、抛光日益精细等特征，而且杭州湾

两岸玉器发展水平达到惊人的同步性⁽⁷³⁾。到了崧泽文化阶段，玉玦材料有了根本性的改观，人们终于发现了美不胜收的真正软玉，并开始迅速推广使用⁽⁷⁴⁾。随着观念形态被物化的程度日益加深，新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5500—4000年阶段，在中国终于形成至少两个以上以玉器为主要内涵的文化分布中心，即北方的红山文化和南方的良渚文化⁽⁷⁵⁾。

良渚文化玉器属于阳起石-透闪石系统，品种繁多，大致可分为独立的单体件、组装件、穿缀件和镶嵌件四类⁽⁷⁶⁾。单体件主要有璧、琮、镯形器等。组装件主要为梳背、钺及其一整套组合件、三叉形器、锥形器和柄形器、端饰等。穿缀件包括管珠、玦、璜、圆牌、半圆形饰、带盖柱状器、带钩等。镶嵌件如镶嵌玉件的柄类、漆杯等。

玉器主要出土于大中型墓葬。以反山为例⁽⁷⁷⁾，11座墓葬出土器物编号为1276个，单件（尚未计玉粒和玉片）总数为3381件，其中玉器达3223件，占全部随葬品的95%以上。反山M12出土玉器种类约有32种以上，包括琮、钺、璧等重器，其中一些琮、钺、杖镞、杖瑁、柱形器、半圆形饰、锥形器和特殊长管上均雕琢有繁缛不一的纹饰。这些纹饰的雕琢技术相当成熟，与玉器发生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如一件柱形器（M12：87）在展开面积不足135平方厘米的面积上雕饰了12个神人兽面纹图案，一件杖镞（M12：90）上雕琢的弦纹在宽仅2.2毫米中竟达10条之多。

大型墓葬往往位于高土台祭坛之上。目前在太湖流域的浙江、江苏、上海等地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人工营建的高土台祭坛及墓地已超过百处，可以分为五个级差，反山、瑶山、汇观山等为第一级，福泉山、张陵山等为第二级，荷叶地、亭林、新地里等为第三级，达泽庙、大坟墩等为第四等，平丘墩、徐步桥等为第五等，这些土台大的堆土量达数万立方米，小则不足百立方米⁽⁷⁸⁾。

大中型墓葬和高土台祭坛的营造意味着建筑技术的进步。农业与定居虽然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稳定的农业经济可以使定居逐渐稳定且形成规模化，并使建筑技术得以发展。作为东西方两大建筑体系中东方木构建筑最关键的技术因素之一的榫卯结构，其构件最初发现于河姆渡遗址，主要类型有11种之多，后世常见的梁柱相交榫卯、水平十字搭交榫卯、横竖构件相交榫卯和平板相接榫卯等都已具备。接着同时期或稍早的罗家角、跨湖桥也都有发现，良渚文化时期如卞家山遗址⁽⁷⁹⁾等也有揭露。干栏式建筑并非杭州湾两岸独有，人类在相似环境下都有采取如此建筑形式的可能，如欧洲的湖边居址、现代非洲的一些土著建筑⁽⁸⁰⁾。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虽均为干栏式建筑，但这种建筑形式并非唯一的。为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同一文化的人们会选择不同的建筑形态。良渚文化时期建筑类型至少有五种：一是干栏式，如仙坛庙出土陶器盖上刻画了一座单体的干栏式建筑形象⁽⁸¹⁾；二是半地穴式，卞家山出土了一件陶屋模型⁽⁸²⁾，实例可见江苏龙南遗址88F1等⁽⁸³⁾；三是地面起建式，实例有普安桥F3⁽⁸⁴⁾等；四是利用山坡坡度、顶部一侧以木柱支撑而另一侧直接搭于上坡处的简易“棚屋”，如萧山金山遗址F1⁽⁸⁵⁾；五是大型高台建筑，如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乌龟山、反山、瑶山等。

莫角山遗址是大型高台建筑的典范。位于杭州良渚的莫角山一带的多个高土台构成良渚文化的中心城堡建筑。根据历年的遥感照片，莫角山城主城墙东西长600、南北宽450米，呈长方形，城内由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三个矩形土台以及一座圆形双层土台组成⁽⁸⁶⁾，显然是个规划有序的宫殿区域。据2006—2007年的发掘显示，莫角山四周有一圈古城墙，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总面积达两百九十多万平方米，城墙底部宽达40—60米，保存较好的仍高达四米⁽⁸⁷⁾。因此，莫角山地区在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了大城套小城、具有多重城墙的城址。

营建多重城墙、宫殿、高台祭坛、大中型墓葬并随葬大量精美的玉器显示了权力分化和集中并存的社会背景。例如，高台祭坛从不足百立方米到超过数万立方米的土方量，需要集中劳力集体劳作才能完成，甚至是长时间的。无论它是通过何种组织形式来实施的，能长时间动用集中的劳力，说明人群内部之间的关系已经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再如制作如此多且精致的玉器，不仅需要专门的玉作工匠，即作为一种完全独立的手工业——不同于早期农业聚落中农业与手工业之间还存在着诸多模糊的界限，而且玉作行业内部的分工也日益明显，更为重要的是整个玉作行业从农业中独立出来的目的仅仅是为少数人提供奢侈消费品。完成浩大工程以及某个手工业完全从农业中独立出来并只向少数人提供非生活必需品，还需要完成财富的积累和集中。财富的积累是广泛的，但财富的集中则是个别的，且离不开权力中心的保障。位于重重围墙之中宫殿内的中心的权力，则由不同等级的祭坛及墓葬所体现出的金字塔形社会

结构加以保障和实施。

得到保障的权力仍然需要强化,除了动用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外,意识形态手段则更为高效和合理,如高台祭坛的营造和使用,玉器和陶器的礼器化。

作为宗教活动场所,这里讨论的目标不是祭坛的营建,而是其功能。祭坛最早出现在马家浜文化时期,崧泽文化阶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为良渚文化所继承,如仙坛庙遗址就发现了一处在崧泽文化早期和晚期人工堆筑,并经崧泽、良渚过渡期到良渚文化晚期多次扩建且持续使用的高土台祭坛及专用墓地⁽⁸⁸⁾。高台祭坛主要出现在太湖流域,钱塘江以南目前尚未发现这种传统。高台祭坛在崧泽文化时期主要分布于太湖东部和北部,良渚文化早期突然出现在良渚遗址群一带,显然良渚遗址群所代表的人群是由外地迁徙而来,其背后应该存在着一个像莫角山那样拥有很大支配权的政治权力中心⁽⁸⁹⁾。

良渚文化的高台祭坛中有一类属殡葬型祭坛⁽⁹⁰⁾,如反山、瑶山、汇观山⁽⁹¹⁾等。殡葬型祭坛墓地以及其他较大类型墓葬出土的玉器上经常可见一些雕琢的神秘图案,繁简不一。在良渚文化以前的许多遗址中也有一些神秘的刻画、彩绘图案以及动植物形象的雕塑被发现。跨湖桥出土了一些彩陶,最常见的有一种“太阳”纹,下面往往绘有一圈叉形纹。河姆渡陶器上以刻画植物、成对动物及其他神秘图案的较多,如T33④:98刻纹陶块、T29④:46陶盆、T243④A:235陶钵、T21④:18骨匕、T226③B:29象牙蝶形器、T221④:232陶盆、T213④:84陶块、T33④:90陶块等,涉及的动植物有猪、鸟、稻穗、禾本或大叶类植物。以往这些形象,有些常被释读为图腾。张光直先生早就暗示过这种努力的徒劳和结果的错误是无可避免的:“中国考古学上能不能找到图腾呢?如果有就可以。但图腾只能在考古解释程序的最后一步去找,而不能在第一步便假定下来。我相信在中国考古学上要证明图腾的存在是很困难的。”⁽⁹²⁾图腾的概念来自民族学材料,其最重要、最稳定和遗留时间最长的成分有三:具有共同的群体图腾名称,相信图腾群体成员能够化身为图腾或图腾化身为人类,人起源于图腾并认为人与图腾存在血缘亲属关系的信仰⁽⁹³⁾。实际上,跨湖桥和河姆渡的这些有生命或者无生命的图像,似乎与农业具有一定的关联,至少还没有证据能够确切地说明它们具有图腾或宗教的性质。图腾崇拜经历了氏族图腾崇拜、个人图腾崇拜、家庭图腾崇拜和部落图腾崇拜四个阶段,部落图腾崇拜是氏族图腾崇拜的残余。在早期阶级社会里,图腾动物被视为神的表象,成为特别尊崇的客体,作为神圣的生物或神的化身⁽⁹⁴⁾。良渚文化中神人兽面纹、龙首纹、鸟纹等神秘图像,是否就是某种图腾残余形式仍是一个需要艰苦证明的难题,但是无论如何它们所具有的宗教化倾向已经显而易见。

良渚文化玉器多作为一种非实用的礼器使用,并形成了一系列规范,无论表达的是不是对天人关系的强调,或对祖先的敬畏,都形成了世界文明史上独特的文化特征。神人兽面纹、龙首纹等纹饰不仅仅在中心区域各墓葬出现,而且在整个太湖-钱塘江区域内普遍存在,图案规范,呈模式化。因此,“祭坛和玉质礼器已成为神权的象征和社会存在和运转的基础”⁽⁹⁵⁾。

值得补充的是曾经被忽视了的陶器礼器化趋向⁽⁹⁶⁾:陶器的生产和改进原本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之需要与方便,如马家浜文化出现鼎并逐渐取代釜,延续到良渚文化则成为唯一炊器。但是,在崧泽文化时期的太湖流域,随葬陶器出现了明器化趋向。良渚文化的陶器,功能则更趋分化:有的经常在遗址地层中出现,如橙红陶罐、实足盂;有的多在墓葬中才有,如夹砂圈足罐、三鼻簋;有的主要在贵族墓葬中出现,如磨光黑皮陶、刻纹陶器;有的多存在于平民墓葬中,如双鼻壶。反山和瑶山墓地的夹砂陶鼎、泥质陶豆、夹砂圈足罐和夹砂陶缸这套陶器组合,基本不见于一般平民墓葬中,成为贵族阶层独享的、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有理由相信贵族墓葬中的明器化陶器已经上升到礼器的层面。同样,随葬豆、双鼻壶、三足盘和带流单把杯等刻纹陶器的墓葬往往伴出玉琮、玉璧或玉钺等,在整个墓地中处于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刻纹陶器也应纳入礼器范畴。“陶质礼器与玉质礼器交相辉映,扩展了良渚文明的深层次内涵。”

此外,奢侈品的消耗也是权力得到保障和强化的体现。除了玉器以外,丝织品、漆器等非生存必需的消费品也时有出土。以经纬方式编织竹、苇制品的时代至少在8000年以上,以类似方式编织的纺织品可能源于此。由于埋藏条件的差异,有机质器物中有些得以保存下来,而更多的则被完全分解。例如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曾出土过较早的纺织品实物:在属马家浜文化的T202第10层中发现了三块炭化纺织物残片,经鉴定“认为纤维原料可能是野生葛,织物

为纬起花的罗纹织物，织物的密度是，经密每厘米约十根，纬密每厘米罗纹部约二十六至二十八根，地部十三至十四根，花纹为山形斜纹和菱形斜纹，织物组织结构是绞纱罗纹，嵌入绕环斜纹，还有罗纹边组织”⁽⁹⁷⁾。关于丝绸的时代最早的信息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蚕纹象牙端饰所带来的，虽然还无法确定其是否为家蚕，但无论如何丝绸纺织的基础——对蚕的认识和重视至少已开始。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一些可能是纺织使用的骨、木质工具，陶纺轮数量和类型也较多，可一窥纺织的普遍程度。良渚文化的陶纺轮同样的多，除了陶质和石质纺轮外，反山还出土了玉质的纺织工具纺轮和挺，以及钱山漾出土的绢片，更是透露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等级顶端人群精神上 and 观念上的追求趋势，丝绸织品的生产和使用，应该已经不完全是为了保暖和遮体那么简单了，也难怪有观点认为玉器和丝绸是良渚文化衰落的两大物质诱因。

另外一种奢侈品漆器在良渚文化时期也被较多地生产。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出土的木碗（T231③B：30）经红外光谱分析，器表所髹朱红色物质与漆相似，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并经检测的最早的漆制品。实际上河姆渡遗址中比第二期更早的第一期，即第④层还出土过五件筒形木器（T17④：23、T17④：103、T242④B：351、T214④A：102、T213④A：94）、三件蝶（鸟）形木器（T17④：37、T226④B：160、T242④B：329）、一件木器残件（T235④A：105）和五块彩陶残片（T17④：9、T16④：61、T211④B：523、T231④B：283、T233④B：223），器物上往往有黑褐色、酱褐色的“涂料”，这是否也为漆器呢？良渚文化的漆器有两类，一类在陶器上施漆，一类在木器上髹漆且常常镶嵌大量经打磨抛光过的玉粒。漆的颜色均为朱或黑两色。例子很多，如海宁王坟J2：2觚形朱漆陶杯⁽⁹⁸⁾，海盐仙坛庙M5：2朱漆陶豆⁽⁹⁹⁾，瑶山M9：78嵌玉朱漆木杯，反山M12：1嵌玉漆木杯。卞家山遗址则出土了漆觚、椭圆筒形漆器、漆盘、漆豆、彩绘残器等多种器形，生动地再现了良渚文化的漆器制作水平⁽¹⁰⁰⁾。

总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剧。由少数人组成的贵族集团通过控制人、财等经济资源，营建城堡、大型祭祀建筑及墓地，消耗大量玉质礼器及其他奢侈品，并强化宗教信仰及其地位，实现政治权、经济权、军事权和神权合一。因此，“文明起源的本质在于复杂社会中劳力与资源的集中所造成的不平等，使得贵族阶层能将宗教信仰与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强化其权力”，“文明实质上是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力的物质表现”⁽¹⁰¹⁾。

四

作为浙江地区的“史前双璧”，见证稻作农业起源过程的河姆渡文化和文明起源历程的良渚文化，其学术价值和地位在中国考古学领域是无可替代的。然而，通过数千年积累而形成的良渚文化辉煌文明，在距今四千余年由于复杂的社会因素和气候、环境出现重大变迁的双重作用下，变得十分脆弱而走向式微，社会复杂化进程戛然而止，整个社会回复到原始平等的状态⁽¹⁰²⁾。

对于良渚文化的下限历来就有争议，或为距今4200年，或为距今4000年。2005年湖州钱山漾遗址经第三次发掘，发掘者将其及第一、二次发掘的下文化层认识为一种介于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之间、分布于太湖地区的新的文化类型，并提出“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概念⁽¹⁰³⁾。但是一些学者依然认为钱山漾类型属于良渚文化末期范畴。为了便于认识和研究，本书将钱山漾遗址出土文物单列，所以姑且采用“距今4200年”的良渚文化下限。

浙江地区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片言只语，为有关越的内容，见于今本《竹书纪年》，事在约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期⁽¹⁰⁴⁾。对于这一地区先越时期的认识仍然需要完全依靠考古学手段获得，所以将马桥文化纳入史前系统叙述。相当于马桥文化时期，在浙江地区又有“高祭台类型”⁽¹⁰⁵⁾之称。但是由于马桥文化的上、下限为约距今3900—3200年，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¹⁰⁶⁾，同时高祭台类型包含的时间跨度过长，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至春秋战国时期，而高祭台类型的早期阶段实际上应属马桥文化内包含的肩头弄类型遗存范畴，所以本书仍采用“马桥文化”这一名称。

马桥文化的构成因素较为丰富和复杂，既有承续的当地土著文化，又有北扩而来的浙闽交界的肩头弄类型遗存，还有夏商文化、岳石文化，以及“各文化要素和文化传统在冲突、融合和变异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全新内涵”⁽¹⁰⁷⁾。但以肩头弄类型为代表的浙南闽北地区文化因素，虽然在马桥文化构成中占重要地位，然而两者的差异明显，只有一部

分文化内涵具可比性,甚至可能并不能算作马桥文化的一个类型^[108]。因此,包括早期为肩头弄类型的高祭台类型文化,与马桥文化应当并非同一种文化。实际上在浙江地区这两种文化的内涵、消长和分布情况目前尚未明了。这是需要特别说明和谨慎的。

参考资料

- (1) 牟永抗、魏正瑾《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太湖流域原始文化的分期问题》,《文物》1978年第4期。
- (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3辑,长征出版社1997年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 (3) 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博物馆(蒋乐平)《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9期。
- (5) 张恒、王海明、杨卫《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5年9月30日1版。
- (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好川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113页。
- (7)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浙江省教育厅,1938年。
- (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注④。重排之文参见《浙江文博七十年文萃》,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 (9) 蒋缵初《杭州老和山遗址1953年第一次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
- (10)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 (11)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水田畝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 (12) 汪济英、党华《良渚长坟黑陶遗址清理工作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3期。
- (13)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吴兴县邱城遗址1957年发掘报告初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7辑,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
- (14)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嘉兴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61年第7期。
- (15) 冯信敖《浙江崇德罗家谷遗址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罗家角考古队(姚仲源)《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1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 (16) 党华《浙江嘉兴双桥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通讯》1955年第5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玉贤)《嘉兴双桥遗址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2辑,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 (1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上、下)》,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 (1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 (1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王明达《良渚遗址群再认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8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 (20) 曹锦炎《十年磨一剑——世纪之交的浙江史前考古(代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8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 (2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遗址2006—2007年的发掘》,《考古》2008年第7期。
- (22)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 (2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明达、任世龙)《浙江省考古五十年主要收获》,《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 (2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孙国平、黄渭金)《浙江余姚田螺山新石器时代遗址2004年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1期。田螺山遗址的四个标本,经北京大学14C测定,其中两个第⑧层的数据均在距今8000—7500年之间,接近跨湖桥遗址的年代。
- (25) 新安江水库考古工作队(牟永抗)《浙江省淳安县进贤高祭台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7辑,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新安江水库考古工作队(牟永抗、冯信敖)《浙江省淳安县进贤高祭台遗址第二次发掘总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7辑,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
- (26) 牟永抗、毛兆廷《江山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1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 (27) 泰顺县文博馆(夏碎香、高启新)《浙江省飞云江上游古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7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州市文物处、泰顺县文博馆(孙国平、王海明、田正标、王同军)《浙南飞云江流域青铜时代文化遗存》,《东南考古研究》第2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屹峰、施加农《萧山浦阳江下游史前遗存》,《东方博物》第7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蒋乐平《浦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思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8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 (2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好川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 (29) 王海明、孙国平、蔡钢铁、王同军《温州老鼠山遗址发现四千年前文化聚落》，《中国文物报》2003年5月28日。
- (30) 曹兵武《小农经济与中国文明的形成及特征——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札记之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8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 (31) 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前言第V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 (32) 根据严文明、裴安平统计材料补充而成。严文明《中国史前的稻作农业》，《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裴安平、熊建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47页。
- (33) 何介钧《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09—427页。
- (34) 邹厚本、谷建祥、李民昌、汤陵华、丁金龙、姚勤德《江苏草鞋山马家浜文化水田的发现》，《稻作 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 (35) 蒋乐平、王屹峰、郑建明、孟国平《浙江发现早于河姆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文物报》2002年2月1日。
- (3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页。
- (37) 郑云飞、蒋乐平《上山遗址出土的古稻遗存及其意义》，《考古》2007年第7期。
- (38) 张恒、王海明、杨卫《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5年9月30日1版。
- (39) 郑云飞、蒋乐平《上山遗址出土的古稻遗存及其意义》，《考古》2007年第7期。
- (40) 裴安平、熊建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134页。
- (41) 郑云飞、蒋乐平《上山遗址出土的古稻遗存及其意义》，《考古》2007年第7期。
- (4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 (43) 王屹峰《跨湖桥遗址刍议》，《故宫文物月刊》2003年第8期。
- (44) 郑云飞、蒋乐平《上山遗址出土的古稻遗存及其意义》，《考古》2007年第7期。
- (45) Zong, Y., Chen, Z., Innes, J. B., Chen, C., Wang, Z., and Wang, H. (2007). Fire and flood management of coastal swamp enabled first rice paddy cultivation in east China. *Nature* 449:pp. 459—462.
- (46)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介钧）《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
- (47) 邹厚本、谷建祥、李民昌、汤陵华、丁金龙、姚勤德《江苏草鞋山马家浜文化水田的发现》，《稻作 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 (48) 苏州博物馆、昆山市文物管理所、昆山市正仪镇政府（丁金龙）《江苏昆山绰墩遗址第一至第五次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3年增刊1。
- (49)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吴兴县邱城遗址1957年发掘报告初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7辑，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 (5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毗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454页。
- (5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毗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453页。
- (52)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 (53) 楼航、梁奕建《长兴江家山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8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9页、彩版三六，3。
- (5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湖市博物馆《浙江平湖市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及墓地》，《考古》2005年第7期，图版三、四。
- (55) 裴安平《稻作与史前社会演变的关系新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8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 (5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毗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453页。
- (57) 曹兵武《小农经济与中国文明的形成及特征——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札记之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8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 (5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349页。
- (59) 陈淳、潘艳、魏敏《再读跨湖桥》，《东方博物》第27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6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66、54—55页。
- (61) 罗家角考古队（姚仲源）《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1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 (62)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吴兴县邱城遗址1957年发掘报告初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7辑，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 (63) 崧泽遗址考古队《上海青浦崧泽遗址考古发掘重要成果》，《马家浜文化》，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
- (64)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80—81页。
- (6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页。
- (6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374页。
- (6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
- (68) 徐新民《平湖庄桥坟遗址动物祭祀的初步认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8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 (69) 王明达《重读马家浜》，《马家浜文化》，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版。
- (7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3辑，长征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9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
- (71) 孙国平、黄渭金《余姚田螺山遗址初现端倪》，《中国文物报》2004年8月6日。
- (7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象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蒋乐平）《象山县塔山遗址第一、二期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3辑，长征出版社1997年版。楼航、梁奕建《长兴江家山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8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 (73) 孙国平《河姆渡·马家浜文化玉玦考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6辑，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88、91页。
- (74) 孙国平《河姆渡·马家浜文化玉玦考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6辑，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 (75) 牟永抗《试论中国古玉的考古学研究》，《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
- (76) 牟永抗《前言》，《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90年版。方向明《良渚文化用玉种类的考古学认识》，《东方博物》第15辑，浙江

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7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上)》，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 (7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上)》，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364—365页。
- (79) 赵晔《探秘卞家山》，《东方博物》第24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 (80) 皮埃尔·白特甘著，赵冰译《新石器时代湖边居址和自然资源的管理——一种多学科交叉的环境研究方法》，《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 (81) 王依依、王宁远《仙坛庙干栏式建筑图案试析》，《东方博物》第16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82) 赵晔《浙江余杭卞家山遗址》，《2003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 (83) 钱公麟《吴江龙南遗址房址初探》，《文物》1990年第7期。高蒙河《长江下游考古地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161页。
- (84)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上智大学联合考古队(赵辉、芮国耀)《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4期。
- (85) 孙国平、王海明、王屹峰《杭金衢高速路考古发掘获可喜成果》，《中国文物报》1999年10月6日。
- (86) 张立、吴健平《浙江余杭瓶窑、良渚古城结构的遥感考古》，《文物》2007年第2期。
- (8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遗址2006—2007年的发掘》，《考古》2008年第7期。
- (8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盐县博物馆(王宁远、李林)《海盐仙坛庙遗址的发掘》，《崧泽·良渚文化在嘉兴》，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年版。
- (89) 严文明《良渚文化和中国文明的起源》，《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 (90) 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587页。
- (9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市文管会(刘斌、蒋卫东、费国平)《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3辑，长征出版社1997年版。
- (92) 张光直《谈“图腾”》，《中国文物报》1993年8月22日。
- (93) Ⅱ. E. 海通《图腾崇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 (94) Ⅱ. E. 海通《图腾崇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128页。
- (95) 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574页。
- (96) 芮国耀《良渚文化陶器内涵及其礼器化现象探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8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 (97)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 (9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盐县博物馆(李林)《海盐王坟遗址发掘简报》，《崧泽·良渚文化在嘉兴》，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年版。
- (9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盐县博物馆(王宁远、李林)《海盐仙坛庙遗址的发掘》，《崧泽·良渚文化在嘉兴》，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年版。
- (100) 赵晔《探秘卞家山》，《东方博物》第24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 (101) 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575页。
- (102) 郑建明《环境、适应与社会复杂化——环太湖与宁绍地区史前文化的演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9—260页。
- (103) 丁品《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与“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8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 (104) 陈桥驿《序二》，《越国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 (105) 牟永抗《高祭台类型初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2辑，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 (106)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300页。
- (107) 郑建明《环境、适应与社会复杂化——环太湖与宁绍地区史前文化的演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0—384页。
- (108) 郑建明《环境、适应与社会复杂化——环太湖与宁绍地区史前文化的演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4页。

目 录

序/001

综述/004~013

河姆渡文化/001~070

马家浜文化/071~086

崧泽文化/087~100

良渚文化/101~168

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169~180

马桥文化/181~187

图版目录/188~191

后记/192



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以首次发现地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而命名。迄今发现的河姆渡文化遗址有童家岙遗址、鲻山遗址、田螺山遗址、傅家山遗址等五十余处，均分布于钱塘江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和舟山群岛，其中以姚江平原最为密集。

在河姆渡文化中，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具特色，代表器物有釜、罐、盆、盘、钵、纺轮等，部分器物刻画动植物纹及几何纹样，动植物的描画具体形象。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小件陶塑。石器种类较少，仅斧、锛等几种。利用萤石、石英等石料制作的具有玉器功能的玦、璜、管、珠等小件玉石器已经出现。骨器丰富，且种类繁多，有耜、镞、针、凿、锥、匕、梭、笄、哨等，许多器物上也刻画繁缛纹饰。

河姆渡遗址位于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东部，四明山区北麓和慈溪南部山地之间的峡港型海积平原——余（姚）慈（城）平原中。1973—1974年、1977—1978年两次发掘，遗址自下而上叠压着四个文化层，据碳14测定并分为四期，第一期即第④文化层距今约7000—6500年，第二期即第③文化层距今约6500—6000年，第三期即第②文化层距今约6000—5500年，第四期即第①文化层距今约5500—5000年。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六千七百余件，清理了大面积的榫卯木构建筑以及少量墓葬，还发现了丰富的栽培稻谷、大量野生动物及家养动物骨骼、采集所获的各种植物果实。